



嘉兴市文化局 编

嘉兴  
博物馆馆藏文物  
精品集  
器物卷

浙江摄影出版社

嘉業堂

博物館館藏文物

精品集

器物卷

浙江摄影出版社

嘉兴市文化局 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 / 嘉兴市文化局编。—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686-553-8

I.嘉... II.嘉... III.文物—嘉兴市—图录  
IV. K872.55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904 号

责任编辑 沈钰浩  
特约编辑 左亚琳  
视觉策划 未来海岸文化传播  
装帧设计 沈钰浩  
责任校对 程翠华 朱晓波

**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  
嘉兴市文化局 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www.photo.zjcb.com](http://www.photo.zjcb.com)  
邮 编：310006  
制 版：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x1092 1/8  
印 张：32.5  
印 数：0001—2000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6-553-8  
定 价：480.00 元

主 编 王鸣霞  
副主编 陈保良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鸣霞 王子湘 方国权 朱殷治  
李 林 陈保良 陈建江 张镇西  
张坤泉 张金荣 陆福生 林亚华  
高而申 程 杰 葛金根 戴雨频  
编 校  
陈建江 葛金根 方国权  
摄 影  
沈钰浩 葛金根 黄才祥 谭 杰  
吴海红 等





# 序

登上古老的古鳌塔，观看波涛汹涌的钱江潮，偶发感叹：潮起潮落，后浪推前浪，那不就是历史吗？

环视今日嘉禾大地，现代化浪潮正在高歌猛进，所有县（市）进入国内五十强行列，零资源经济奇迹迭出，城乡一体化率先起步，足以使人瞩目和惊叹，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衬托着这高涨的潮头呢？

穿越历史的长河寻找它的源头。从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点燃人类活动的星星之火，到良渚文化升起的文明曙光；从三国嘉兴城市的兴起，到隋朝运河把嘉兴与南北相连；从宋代州府格局的奠定，到明清时期孕育出清新雅致、绚丽多姿的江南水乡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勤劳智慧的嘉兴人民在这片风光秀美的江南沃土上，创造了坚实雄厚的物质财富和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称誉，标志着在农业文明时代嘉兴经济社会达到了顶峰。

辉煌的物质成就背后支撑着的是厚重博大的文化底蕴，是千百年来在嘉禾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永恒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与非物质的形式留传了下来。博物馆是城市文化的名片，是历史文明的窗口，承载着沟通过去与未来的神圣职责。全市各博物馆收藏的5万余件文物，既是浓缩与见证了嘉兴历史发展的精华，更是建设文化大市、打造人文嘉兴的原始资本和基本财富。《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的出版，将带你一起走进历史，在文物鉴赏中驻足，在文化镜像中思忖，在文明细节中品味，在水乡行走中流连。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400多件（组）代表性文物，凭借独特的视角，简洁的文字，隽永的画面，从一个地域感受民族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灵魂的搏动，以期实现文化的浸润和心灵的启迪，进而转化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竭源泉与持续动力。

嘉兴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德荣

2006年11月28日



# 目 录

嘉兴

博物馆

馆藏文物

精品集

器物卷

7	序
10	绪论
16	嘉兴历年考古综述
25	马家浜文化
35	崧泽·良渚文化
81	先秦
103	秦汉六朝
133	隋唐五代
151	宋元
193	明清
252	后记

# 绪论

嘉兴地处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左杭右苏，负海控江”，是一座有着丰厚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下辖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五个市县及南湖、秀州两区。这里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素称“鱼米之乡”。

这块美丽而又富饶的土地，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孕育了古老而又绚烂的文明。它们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且又震古烁今，日后熔铸成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筚路蓝缕的开拓者，曾创造出的许许多多辉煌成果，也不间断地延续、演绎出嘉兴“文物之邦”的美誉。它们既是嘉兴历史延续的信息主体，又是嘉兴人民聪慧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之一，更是嘉兴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和根系。经过碰撞、浸润、涵容、交流，它们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升华，并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了崇文厚德、求实创新的嘉兴人文精神，使嘉兴区域文化内涵丰富鲜明，充满生机活力。

—

早在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嘉兴已有远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掀开了嘉兴历史的帷幕。按照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说的划分，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是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大约距今 7000~5800 年前，马

家浜文化迅速崛起于这一区域，社会生产力先进发达，文化内涵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与周边地域保持着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状态。通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对这个独立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有了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自马家浜文化开始，经过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同时从文化内涵方面观察，上述三个文化发展阶段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过程。嘉兴市及其所辖市县区是这一文化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相同的阶段。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为马家浜文化考古学命名地点的马家浜遗址就在嘉兴市郊。上世纪 50 年代末，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在农田建设中发现的嘉兴马家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的文化遗存以夹砂红陶和磨光石器为特征，还有玉块等玉质制品。至 70 年代，考古学界遂将这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马家浜文化，嘉兴也就由此成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地。这种文化的陶器以表红胎黑的泥质陶最具有特色，器型以炊器中的腰沿釜、“双目式”足的鼎、腹安把手和带管状嘴或流的盉、外红里黑陶豆、“牛鼻式”耳或鸡冠形茎罐等最具典型特征。石器制作亦相当精致，通体磨光，其中穿孔的斧（钺）大都呈舌形、斜肩，与其后石钺、玉钺的出现，有着演变上的关系。在马家浜遗址发掘 20 年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桐乡罗家角遗址的发掘中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据碳 14 年代测定，罗家角遗址第

四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7000 多年，由此将马家浜文化的年代上溯到距今 7000 多年。因此，嘉兴有着 7000 多年的文化发展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早于罗家角遗址第四层的马家浜文化遗存，嘉兴堪称“江南文化之源”。

在桐乡罗家角遗址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中出土了较多的炭化稻粒，经过农学家鉴定，这些炭化稻粒为人工栽培，而且还可以将这些稻粒区分出粳稻和籼稻，可见此时的水稻栽培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罗家角遗址及嘉兴地区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嘉兴是中国最早出现栽培稻的地区之一。7000 多年前稻作农业的产生以及随后的发展，使嘉兴地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中一直处于比较领先地位。

我国具有悠久的用玉传统，太湖流域地区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玉器最为发达的重要地区之一。嘉兴地区的多个马家浜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精美的玉块等玉器，是中国较早使用玉器的文化区之一。

## 二

经过马家浜文化千余年的发展，嘉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在距今约 5800 年前进入崧泽文化阶段。崧泽文化以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命名，就崧泽文化内涵来看，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化发展阶段。在嘉兴的双桥遗址、大坟遗址、南河浜遗址、海盐的王坟遗址、仙坛庙遗址等，都发现了十分丰富和精彩的崧泽文化遗存。陶器制作造型特点和彩绘装饰更富有艺术美感，嘉兴大坟遗址的人首陶瓶，嘉兴南河浜遗址的鹰头壶、塔形盉、兽面盉和陶龟，海盐仙坛庙的朱绘黑皮陶壶等，尤为珍贵。

当历史的步伐跨入距今 5300 年左右，嘉兴地区进入良渚文化阶段。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同时期较为发达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以上世纪 30 年代发掘的杭州郊区良渚遗址命名。嘉兴地区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已经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有 200 余处，这些遗存特别集中于以海宁和桐乡、海宁和海盐的接壤地带，以及嘉兴与平湖、嘉善交接一线为中心的区域。历年的发掘成果令人瞩目，发现高土台和随葬壁、琮、

钺等玉质礼器及精致的陶器等，嘉兴南河浜遗址、桐乡新地里遗址、海盐仙坛庙遗址、平湖庄桥坟遗址等先后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嘉兴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虽然没有发现如余杭反山、瑶山那样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墓葬，但在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许多随葬玉质礼器的贵族墓葬，其中不乏出土了一些十分精美而有意义的良渚文化玉器。除余杭良渚遗址群之外，桐乡是唯一出土玉三叉形器的地方；海盐周家浜遗址完整形态的冠形器的出土，不仅体现了良渚文化镶嵌工艺的高超水平，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冠形器的性质及使用状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而在桐乡的新地里遗址和平湖的庄桥坟遗址发现的分体石犁，显示出良渚文化的农业已完全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由此带动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早期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嘉兴地区文化与整个良渚文化发展同步，这表明它在距今 4200 余年前逐步叩开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门，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三

距今 4100 年左右，光彩夺目的良渚文化整体向北迁徙，嘉兴历史进入了马桥文化及吴越文化时期，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灭楚而尽收吴越之地。这就是历史上的先秦时期。相对于中原而言，夏商之际至战国前期，在嘉兴这方土地上繁育了马桥文化（浙江考古界称高祭台类型），普遍出现了硬陶器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以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命名的马桥文化，其遗存在嘉兴亦多有分布，如嘉兴高墩遗址、嘉善大往遗址、海宁三官墩遗址，均发现了马桥文化的地层，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的硬陶高领罐和鸭形壶，但这些遗址保存均不理想，而同一时期的土墩遗存保存状况相对较好。这些土墩遗存，是商周时期吴越地区特有的一种葬俗，分布广，数量多，延续至战国早期才逐渐为土坑墓取代。这种以封土成墩为特征的古墓遗存——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以随葬印纹陶和原始瓷器为基本内涵，往往按山形走向布列在山脊或山顶部位，多数平地起建，一墩一墓，也有一

墩多墓情况。在海盐、海宁沿杭州湾北岸一带的山上分布着数百座土墩遗存，海宁夹山更为突出。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考察，先秦时期的嘉兴发展脚步迈得蹒跚而缓慢，但已从新石器时代缓慢地跨入了青铜时代。1983年，嘉兴雀墓桥遗址上层发现了铜渣。这或许是冶炼青铜器迹象在嘉兴的首次发现。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随之萌生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辉煌的霸业，嘉兴也成为吴越相争、风云迭起的战场。公元前496年发生于此的槜李之战，已载入孔子所作的《春秋》中，使嘉兴第一次载入史册而为后世所知。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3年，楚败越，嘉兴属楚百余年。嘉兴各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剑、矛、铍、戈等兵器，反映了吴越两国连年争战这段历史。出土及馆藏青铜器中也不乏镰、耨、锄、锸等农具，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刃部带有锯齿的镰、耨，成为稻作农业的典型农具。工具各有分工，表明农业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也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改造相辅相成，使这里逐步转变为富庶之地。在各类相关的遗存中，一般均可找到成为吴越文化标志的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出土的印纹陶器以罐、坛、瓮等盛贮器居多，而原始瓷中的釜形鼎（越式鼎），造型别致，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海盐黄家山战国墓出土的成组编套乐器，内有原始瓷甬钟、勾鑃、𬭚于、铃及泥质陶纽钟、磬等，器形、纹饰精美，弥足珍贵。

## 四

秦汉一统，随着汉人南迁和中原文化的南传，嘉兴历史进入了民族文化融合与转型的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今嘉兴市成为一个重要的聚落。秦朝（前221—207）在今嘉兴境内设由拳县和海盐县，成为全国推行郡县制建制最早的一批县，分属会稽郡，为今嘉兴市境建制之始。进入汉代，这里仍为由拳和海盐两县，属会稽郡，曾是吴王刘濞的属地（前195—前154）。王莽篡汉建立新朝（8—23），海盐更名为展武县，东汉又复原名。会稽郡在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析置吴郡，由拳和海盐两县归属吴郡。1973年海宁长安中学发掘的东汉画像石墓，为江南首次发现的出土了大面积、内容丰富画

像石的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内容有车马出行、乐舞百戏、庖厨宴饮、建筑雕刻、历史故事、祥瑞兆庆等，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物质精神世界，可见墓主身份非同一般。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这一地区已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水平。

聚落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地广人稀的状况开始改变。劳动力的增加，也促进了地区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境内大量汉墓的发掘，如嘉兴皇坟山东汉墓、海盐龙潭港东汉墓、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和龙尾山汉墓、桐乡宋家桥汉墓群和河山石栏村汉墓群等，当时人们所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明器的大量出土，就是明证。墓内普遍随葬高温硬陶和釉陶器，有鼎、盒、壶、瓶等品种，常伴出铜镜、钱币、铁制兵器及生产工具。墓葬明器，从仿铜礼器演变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灶、井、仓、家畜等模型。这表明陶瓷器为当时普遍使用的生活器具，同时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逐渐普及，而先前的青铜器具转变为日常生活器具以及用于流通的钱币。这一转变过程，正好体现当时地域经济和人口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日用品中较常见的铜镜，纹饰丰富优美，流行四灵、禽兽、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题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铸造工艺，传达了当时的人文思想、信仰和审美观念以及与西域外来文化的交流状况。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孙吴立国江东，开拓疆土，新建郡县，析由拳、海盐置盐官县，属吴郡。两晋、南朝时期，嘉兴建制如旧。梁时曾分海盐县置前京（今上海金山县境和嘉兴平湖市境）、胥浦（今金山县境）两县。陈永定二年（558）设海宁郡，海盐、盐官、前京属之。这是秦汉一统之后天下由合转分的时期。黄河流域连年混战，北人相率避难南迁，前一次在东汉末至三国吴，后一次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北方移民的陆续迁入，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对粮食为主体的生活消费品需求也随之大幅度提高，使今嘉兴境域土地得到空前开垦，著名的事例有三国陆逊屯田、西晋高使君屯田等。东吴黄龙三年（231），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视为祥瑞，遂改由拳县为禾兴县。赤乌五年（242），孙权立和为太子，为避讳，改禾兴县为嘉兴县，“嘉兴”作为县级政区之名由此始，相传黄龙三年曾建嘉兴县城。

由于区域土地的开发，人口移居或停留者增加，聚

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扩散。东汉六朝墓葬的大量发现，为本区域人类的活动及其聚落发展提供了佐证，如嘉兴皇坟山、平湖平丘墩、海盐南台头丁升墓、海宁翟妃墓和黄武庙山墓等。出土随葬品多为青瓷器，常见器型有罐、壺、盘、碗、钵、灯、砚、水盂、烛台等，造型简朴、实用。以动物形象作装饰成为此时的一个显著特点，狮形器、羊形器、母子羊塑、蛙形水盂等，造型优美，别致可爱。鸡首壶在肩的一面加饰鸡头，另一面安把手，上接盘口，是最具两晋特色的器具。此外，还有盘口壶，自东汉以来壶口逐渐扩大，颈部逐渐升高，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种实用器皿。这些瓷器既是日常生活器具，又是装饰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审美情趣。嘉兴境域迄今尚未发现青瓷窑址，相关瓷器大多应产自会稽郡上虞曹娥江一带的瓷窑。

## 五

隋统一江南后，嘉兴并入吴县，唐贞观八年（634）复置，属苏州（原称吴郡）。海盐县自隋开皇九年（589）并入盐官县后，废兴无常，至唐开元五年（717）再置，才得稳定。隋开皇九年废海宁郡，盐官县属杭州（余杭郡），唐武德七年（624）盐官县曾并入钱塘县，贞观四年（630）复置，后一直属杭州。唐天宝十载（751），析嘉兴县东境及海盐县部分辖地置华亭县（属苏州），孕育了后代松江府境域的松江、青浦、上海等县的诞生。五代十国时，嘉兴、海盐、盐官初时俱属杭州。唐文德元年（888），吴越王钱镠命阮结筑嘉兴城，后晋天福四年（939）又拓罗城。后梁开平三年（909）析吴县和嘉兴二县部分地置吴江县。吴越宝大二年（924），因钱镠微时有旧馆在嘉兴县钱林村，遂在嘉兴县置开元府，并割华亭、海盐二县属之。但至后唐长兴三年（932）罢去，这是嘉兴历史上首次设立州府级机构。后晋天福三年（938），析嘉兴县西置崇德县。同时分苏州置秀州，为吴越国所辖十三州之一，领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嘉兴县为秀州治所。

隋唐五代时期，江南运河的开凿，河道的通浚，圩田的整治，农耕工具的改进，江南成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到了唐末，两浙，尤其是嘉兴一带成为全国重要农业区和粮食生产基地。李瀚《苏州嘉兴屯田纪绩

颂》说“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嘉土田二十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更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险”的评价。历史上延续十多个世纪的南粮北运就是在这个时期从这个区域开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可以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连丧葬都有法令规定的礼仪，厚葬之风较盛。不过在今嘉兴境内的隋唐五代墓发现数量相对较少。但各博物馆所收藏的器物中仍有不少墓葬随葬的精品，如海宁博物馆的青瓷兽蹄足砚和青瓷盒、桐乡博物馆的鎏金铜伎乐腰带等。此外，这一时期的器物亦有零星出土，如长沙窑和越窑执壶及铜镜等，各博物馆大多有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兴盛，寺塔幢遍布各地，据记载，唐时嘉兴、海盐两县建有佛寺33所，可惜它们大多湮没无存。嘉兴境内现存的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建筑有海宁盐官安国寺经幢、硖石惠力寺经幢等，这些著名经幢，构成了境域独特的佛教文化。嘉兴各博物馆收藏的佛教文物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吴越国王钱（弘）俶制作的阿育王塔，嘉兴博物馆藏鎏金铜阿育王塔和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的铜阿育王塔，均镂刻反映佛祖生前善行的本生故事及一生事迹的佛传故事，人物造型栩栩如生，线条柔美，弥漫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种塔同时也真实再现了当时建筑业的繁荣和建筑技术的高超。作为一种文化，宗教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文化氛围，当然其中也有地理环境优越的因素在起作用。

## 六

入宋，嘉兴上隶两浙路，北宋熙宁七年（1074）起隶两浙西路，建置如旧。政和七年（1117）赐嘉禾郡，南宋庆元元年（1195）因孝宗出生于秀州临青闸之官舍，升郡为府。嘉定元年（1208）又升为嘉兴军，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设嘉兴府安抚司，旋升为嘉兴路（设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1284）后隶于江浙行省，下辖松江府和嘉兴、海盐、崇德三县。松江府原为华亭县，因民物繁庶，至元十四年（1277）升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至元二十八年（1291）脱离嘉兴路而直隶于江浙行省。

宋元时，嘉兴社会经济得到更为迅猛的发展，户口繁衍，区域人口密度大幅增加，元初嘉兴路人口达到

2245742，跃居全国首位。海盐、崇德两县和杭州路盐官县也因户口繁多于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人口增长促进了消费，使商贸活动在更大区域内开展，也使得当地的商业和市镇一并发展繁荣，出现了许多商业经济活动密集的江南市镇。如海盐澉浦镇“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成了商贾贸易往来的要冲之地，又逐渐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港口，“远涉诸藩、近通福广”。南宋开禧元年（1205）置澉浦水军驻扎此地，设统制摄领，隶殿前司。嘉定、绍定、嘉熙、咸淳年间（1208—1274），澉浦水军由嘉兴府节制。淳祐六年（1246），又创市舶官，元至元十四年（1277）设市舶提举司。1978年开挖长山河时，在澉浦出土九枚宋代军印，就是澉浦在昔日突出地位的明证。

嘉兴各博物馆收藏的宋元瓷器，有大量是浙江越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河北磁州窑生产的，各竞风流，又异彩纷呈，说明当时商贸交流已相当发达。在这些瓷器中不乏精品，如嘉兴博物馆的龙泉窑青瓷高式炉和荷叶盖罐、嘉善博物馆的磁州窑梅瓶、桐乡博物馆的越窑夹层碗等。嘉兴市区天官牌楼窖藏出土的一件龙泉窑青瓷荷叶盖罐，罐内有序盛放青白釉瓷碗10件。盖罐上条楞形莲瓣纹装饰与卷曲的荷叶形器盖相映成趣，釉色滋润，文静素雅，为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物，也是探讨元代嘉兴酒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

海宁袁花至正十年（1350）贾椿墓出土的白棉布，是研究中国纺织史极好的资料。海宁元时属杭州，紧邻嘉兴，植棉纺织业自宋元以来传入江南地区，嘉兴、松江一带是较早引进棉花加以培植的地区，不论是棉花的种植规模还是棉纺织技术，在全国都较为领先。《嘉兴府志》便将木棉与丝、绵等丝织品并列，作为地方土贡。贾椿墓内还出土有带盖圆漆盒。平湖清理的北宋政和八年（1118）鲁寿宁夫妇合葬墓也发现过漆唾壶，均是素漆的日用器具。其实元时的嘉兴已成为漆器生产的重要地区，文献中有官府置官生产漆器的记载，剔红、剔犀漆器享誉天下，出现了钱金银名家彭君宝、雕漆巨匠杨茂和张成等，他们遗留下来的作品已成为稀世之宝，为故宫博物院等珍藏。元至正年间银器铸造名家魏塘朱碧山，善制槎杯，所铸虾杯、蟹杯、人物杯等酒具，亦极精妙，时人已极为珍重，后世名士诗人交相赞誉。现存的几只银槎杯，国内外均有收藏。宋元时期嘉兴生产的

传统工艺品赫赫有名，故当时成书的《奥地纪胜》谓嘉兴“百工技艺与苏杭等”。

嘉兴市境内清理的宋墓多为券顶砖室墓，也有砖椁石顶墓，墓内一般置铁牛、陶罐、瓷碗、铜钱等，数量不多，墓内多数发现墓志，这是宋代薄葬风气的反映，也是宋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1977年清理的海宁东山14座宋墓，为宋代墓葬形制结构演变的断代及分期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墓内随葬品以青白瓷器最为多见，又以注碗和注壶最具特色，伴出盅托、碗等。作为北宋普遍流行的酒具，注碗和注壶等的随葬，显示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是人们追求生活享受的一个表现。

社会风俗的另一方面，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热情持续不断，所激发的虔诚在众多佛塔的遗存中均有反映。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各类器物60余件（组），质料有金、银、铜、玉、水晶、玛瑙、琉璃、珊瑚、叶蜡石等，多属善男信女所奉献的供养物。2003年清理的海盐镇海塔地宫，出土贴金铜观音像、汉白玉三世佛像外，更多的为鬲式炉、净瓶、磬、钟、簋、貫耳壺等众多的宋元时期仿铜礼器，在以往的发现中尚无先例。嘉兴的辽代彩绘木雕观音像，原由北方寺庙传至嘉兴楞严寺，后由嘉兴博物馆收藏，该像雕工精细，姿态优美，着彩痕迹依然，为不可多得的佛像珍品。

## 七

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平定张士诚后，改嘉兴路为嘉兴府，直隶朝廷。洪武十四年（1381）改隶浙江布政使司，下辖嘉兴、海盐、崇德三县，在地域上最终脱离了吴文化区。宣德五年（1430），因三县地广赋繁不便管理，乃析嘉兴县北境为秀水县，东北境为嘉善县；析海盐县东北部置平湖县；析崇德县东北部置桐乡县。自此，嘉兴府共辖七县，清康熙初虽改属浙江行省并改崇德县为石门县，但嘉兴府县建制稳定不变。明清时海宁仍属杭州。

建制的基本稳定，反映了政治及社会的相对稳定，也为嘉兴经济文化的融会和聚合提供了区域性的空间平台支撑。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嘉兴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改变，以经济作物为主导的商品化种植业迅速发展，形成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商品化手

工业生产，从而带动、促进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并与江南其他城市一起形成了地区乃至全国性的生产和商品集散市场。如经营蚕丝的乌青镇、石门镇，生产丝绸的濮院镇、王江泾镇，生产棉纱的魏塘镇等，都是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发展势头，不仅使嘉兴继续保持其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最终使嘉兴兼具了“鱼米之乡”的美誉，也为嘉兴文化的发达和“文物之邦”的演绎夯实了基础。

明代嘉兴的工艺制作水平在宋元时期基础上继续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漆器制作，依然名工辈出，如张德刚、杨明等。此外，又有张鸣岐铜炉、江千里螺钿等制作绝技。张鸣岐制炉堪称鬼斧神工，“盖极严紧，虽用久，亦不松，盖上花纹极细，以足端之，不庵。炉中炭虽炽甚，而炉体不过热”，令人叹为观止，时称“张炉”，嘉兴博物馆就珍藏有他的作品。论及文物收藏，自然不能不提项元汴，他所建天籁阁庋藏书法、名画以及钟鼎玉石，甲于海内。惜清初“乙酉兵事”（1645）时藏品尽为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所掠、散失殆尽，存世的藏品大多归于清宫内廷，如今海内外均有收藏。项氏家族墓位于嘉兴洪合项坟浜，1975年曾作过清理，发现木质明器、铜质明器、瓷质明器及白布等31件（套），其中木制随葬品有床、长桌、长凳、椅、衣架、盆架。明代家具，过去所见基本为传世品，项氏明墓中木家具的发现，为室内陈设及明代家具断代提供了参考。

明代墓葬的修筑比以往更注意坚固和密封，采用多重棺椁，使用多种方法防腐。保存较好的墓葬，大多有随葬品出土，又以铜镜、饰件数量最多。相对来说，明清墓葬发掘有限。但从各博物馆藏品来看，玉带板、玉带扣、玉带钩、玉佩等，应出自墓葬。明清时期出土单位明确的文物大多发现于佛塔内，如嘉兴东塔的青白玉莲瓣纹帽顶，海盐镇海塔的青铜兽形香炉、水晶鼻烟壶、鎏金银钗，平湖报本塔的黄花梨木质圆罐，嘉善泗洲塔的骑马关公铜像，更多的是各种质地的佛教造像，造型多变、异常生动。

各馆收藏的明清瓷器品类和数量都很多，以彩瓷、青花瓷为主。平湖馆的官窑红釉盆，色釉纯正，殊为难得。嘉兴博物馆的粉彩西厢记人物套杯，将薄胎瓷、彩绘和《西厢记》人物故事有机结合，清新淡雅，柔

丽传神。1974年嘉兴冶金厂工地发现一座明天顺七年（1463）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一件素三彩瓷船。船首开斗状船舱，舱内作出宋钱十余枚，舱上有活动舱板，板上塑一立俑，做前眺状。船舱上有一方亭，亭前台基下塑倚柱立俑一对。台基上有供桌，桌上置双耳瓶和觚形供器等，桌两侧塑俑一对，一立一跪，做供祭状，中部一俑，已残。船尾亦有一方亭，前开拱门，台基下正中塑舵俑（已残），两侧墙各刻划莲花一朵，后墙饰“卍”纹，并以方框开光。全器以银白为地，以黄、绿填绘刻划纹样，素雅柔和，独具神韵。杭嘉湖一带水网地区，有用船为死者送葬的习俗，这件明器瓷船即是江南水乡葬俗的真实写照。同时，这件素三彩瓷船的出土为陶瓷“空白期”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也是研究嘉兴丧葬、民俗的珍贵资料。其他馆藏如青花缠枝牡丹纹碗、青花万寿无疆碗、仿哥窑瓷盘、窑变红鹿头尊、霁蓝釉天球瓶、宜钧蓝釉橄榄尊，等等，精彩纷呈，无不展示着各种官窑的风采。

明清玉器在各馆的收藏中也占有不少份额，品类齐全，以生活实用器皿和玉佩饰居多。不乏质、工、饰俱佳的精致之作，白玉绞丝镯、白玉藕片、白玉合欢猫、青白玉莲瓣纹帽顶等雕刻细腻，琢工精致，打磨光润，表明此时的玉器渐趋脱离五代、宋玉器形兼备的艺术传统而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的艺术风格。文化气息更为浓厚，常见人物、动物、花果、草虫、植物等，福瑞吉祥题材甚为流行，这与当时社会崇尚奢华之风气相符。这种观念还可从市、县博物馆所藏大量以象牙、犀角、牛角、玳瑁等质地制作的器物所雕琢的纹饰上得到印证。

嘉兴也是太平天国后期争战及驻守之重地，境内常有太平天国的文物出土，分路碑、长乐炮台碑及木印等，殊为难得。

当我们面对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精品，似乎联想到在这里繁衍着许许多多顽强进取的嘉兴先民，他们以聪慧和朝气创造着辉煌、影响着后人。作为历史延续的信息主体，它将永远在嘉兴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引领我们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方家关于嘉兴的论著、发掘报告及资料等已多有涉及，给撰写本绪论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借鉴。限于篇幅，而未能注明出处，还望多多谅解。

# 嘉兴历年考古综述

黎毓馨

近两年来，嘉兴先后编辑出版了《马家浜文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两书，对嘉兴的史前考古工作及成果进行了汇总，地域特色鲜明。此次，嘉兴又酝酿编辑《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笔者有幸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与嘉兴的同志一起考察了嘉兴各县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遵嘉兴市文化局之嘱，写下这篇回顾嘉兴历年历史时期考古的综述，奉上一点学习心得，也为此书尽一点绵薄之力。

—

嘉兴境内的考古调查、文物保护工作起步较早。20世纪30年代，文物考古界对吴越地区的考古工作十分关注，当时主持南京古物保存所的卫聚贤、暨南大学教授张天方等曾先后对吴越文化古遗址作了重点调查。民国时期，嘉兴境内的考古调查活动主要有嘉善张济汇考古和胥山、槜李考古及乍浦海岸考古等项目。

民国25年（1936）4月2日，张天方偕蒋大沂、张启鹏来张济汇西、华亭塘北岸的宋末农民李太均、葛道抗元营垒遗址调查，当时的壕沟战垒已平夷，仅发现宋陶多件。4月4—5日，张天方又偕同蒋大沂对胥山、嘉兴火车站旁、三过堂、陆门、南北草荡、槜李亭、濮院女儿桥等吴越界地作了考古调查。据考察，胥山有春秋时期文化遗迹；嘉平公路起点处及苏嘉铁路接轨处，发现有残鼎足、灶基土、残瓦当、陶片及残汉砖、陶壶、铜器等；在陆门桥南东堍水潭上，发现绳纹瓦片、汉晋陶片等物。4月6日，张天方等六七人再至胥山考古，发现大鼎足1件、底座像牛蹄形；不知名陶器2件，状如断树枝，中有斜细孔；涂厚釉陶片三四片，形如拱壁、已残；涂绿色陶片三四片，系晚周型几何纹；涂绿和涂朱陶片

两种：“山海”两字宋元砖1块。同时，卫聚贤、张叔驯、金祖同等在平湖乍浦南关海岸上，发现越国古迹，遗址所占面积极甚广，出土物以古陶片为主，陶片中有多种特异花纹，认为“为国内尚未发现者，实有重大之价值”。为此，卫聚贤请蔡元培致函浙江省政府保护其古迹，省政府又令平湖县政府对该县古迹古物进行调查。

在吴越地区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卫聚贤等约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等人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会址设在上海，江浙设分会，江浙各县设立支会。吴越史地研究会于民国25年（1936）在上海成立，会长蔡元培，副会长吴稚晖、钮永建。嘉善张天方被选为评议，嘉兴胡小石、沈钧儒、汪胡桢，海盐朱希祖被选为理事。在召开成立大会的同时还举办古物展览，展出吴越地区出土的陶器、石器、瓷器多件，内有双桥出土器物。民国26年（1937）夏，吴越史地研究会在嘉兴中山厅召开会议，并展出良渚、双桥等地出土文物50多件<sup>[1]</sup>。

1950年初，嘉兴专署教育处要求各县文教部门调查了解古代文物古迹情况。1954年3月，嘉兴市派人调查三塔、茶禅寺等古迹的破坏情况，同年又配合省文管会调查双桥遗址。1958年6—7月间，嘉兴地区海盐出海口工程指挥部调查了南台头出海口以及沿线范围内的文物情况。1976年2—3月嘉兴地区组织文物干部对长山河沿线文物分布情况进行调查，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嘉兴地区文管会组织文物工作队对长山河施工地段进行现场调查、清理发掘，征集到战国货币、宋代军印等珍贵文物300多件。1982年嘉兴地区文管会根据国务院通知，在全区开展文物普查和复查，嘉兴市文化局于1984年又进一步组织文物普查。历时三年的文物普查，实地查看了4080个文物点，新发现497个文物点，征集到各种流散文物957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1年开始的全